

學人往事

余英時回憶錄(二) ——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 余英時

一 我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1949)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我當然不可能在此對這一大事作深層的、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想借這個機會回顧一下，我自幼年以來怎樣一步一步認識共產主義，和前面談五四運動的方式大致相同。不過，我必須強調，這裏所表達的基本上是我個人的觀點，以親身所見所聞為根據。

我童年有系統的記憶是從抗日戰爭那一年(1937)回到鄉間開始的。但在鄉間九年中，我從未聽過「共產主義」這個名詞。我只知道陳獨秀和胡適是兩個著名文化人物，但陳獨秀又是共產黨的創始人，我便一點印象也沒有了。這大概是因為鄉間沒有甚麼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根本接觸不到城市中流行的新思想、新名詞。潛山縣處於群山之中，官莊鄉更是閉塞，但是，我們鄉下人卻與「共產主義」關係密切的武裝勢力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支勢力便是「新四軍」。鄉下年長的人大概清楚它是屬於共產黨的武裝力量，至於共產黨所奉行的「主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似乎便說不明白了，而且也沒有興趣探問。但我是一個小孩子，沒有人告訴過我「新四軍」即是共產黨的軍隊。所以在重回城市以前，「共產主義」、「共產黨」都是我不曾聽過的詞彙。

在潛山地區活躍的一支武裝力量，1938年被收編為「新四軍」的第四支隊，但這支武裝力量以綁票殺人著稱，官莊及附近便有很多受害人。為甚麼第四支隊這樣兇惡呢？這必須追溯一下它的歷史背景。(按：以下論高敬亭的事跡，我的主要資料來自自己故族人余世儀的〈高敬亭為禍大別山區及其覆亡與翻案始末〉長文。此文後來刊行於紐約《中國之春》和台灣《中國人物》。但我未見刊本，所據為原稿影印本。)

這支武裝力量最早是由一個名叫高敬亭的人組織起來的。高是河南光山縣一個小康之家的子弟，自幼不肯好好讀書，先在鄉間結交一些痞子，為非作歹，到了二十多歲，膽子愈來愈大，竟幹起殺人越貨的勾當。最後在本縣不能立足，他帶着一群農村邊緣份子，竄入大別山區(跨越河南、安徽、湖北的邊境)落草為寇。山區的百姓淳樸，又很怕事，高和他的手下對這些可憐的鄉民予取予求。同時，他們又大批搶奪槍支，擴大徒眾，到1930年代中期已擁有千人左右，自稱「第七十五師」。再過三四年，人數激增至數千，則擴大為「第二十八軍」。這支武裝力量是打着「紅軍」旗號展開活動的，但它和「紅軍」之間究竟是否存在某種組織關係，則外人無從知悉。抗日戰爭發生，國共再次合作，共方正式成立了「新四軍」，終於將高敬亭的武裝力量收編為第四支隊，高本人也被任命為支隊司令員。

關於高敬亭及其徒眾在官莊一帶殘殺百姓的事跡，我初回鄉間便開始聽人繪聲繪影地加以描述，後來又不斷有人重複談及，因此在我童年心中產生了一種很深的恐懼感。最殘暴、規模也最大的一次殘殺事件發生在1935年2月15日，鄉人稱之為「二一五事件」。這一次高派了徒眾五百多人到高莊及附近鄉村綁票，稍有一口飯吃的人都被抓去，一共有三百多個肉票，逼他們共同繳納十萬銀元的贖金，這當然遠遠超過他們的能力。在勒索不遂所欲之後，綁匪大怒，將三百多個肉票集體屠殺了。後來只有一兩個年紀較小的僥倖逃脫，把屠殺的真相傳了出來。

「二一五事件」不僅盛傳於潛山，而且震驚整個南方，上海《申報》、南京《中央日報》等都有報導。這是因為死難者之一余誼密(1873-1935)是安徽的重要人物。誼密先生與我同族而長一輩，他是清末拔貢，一直任地方官，從知縣到道尹都做過。民國以後，他在安徽省很受推重，最先被選為省議長，後來轉入行政部門，先後出任財政廳長、政務廳長，並且一度護理安徽省長。他的官聲極好，為人正派，尤以清廉為人所敬。1930年代初退休後，由於經濟拮据，他住不起城市，因此從安慶遷回潛山林家沖(與官莊是緊鄰)。他的被害特別慘烈，除他自己外，一子一孫也同時遇難。當時報紙對他一門三代被殺之事特加渲染。我這樣介紹誼密先生並非出於宗族之私，最近編成的《潛山縣志》(潛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潛山縣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中有他的傳記，並無一字貶斥，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我回到官莊時，「二一五」慘案才過去兩年，還算是新近的事情，因此仍然是鄉人談論得最多的話題。由於高敬亭一向打着「紅軍」、「革命」的旗號，後來又被正式收編為「新四軍」，所以，「二一五」這筆帳是記在「紅軍」或「新四軍」身上的。但據最近關於高敬亭的史料(如耿嶸：〈槍聲，在這裏回響——高敬亭將軍傳略〉，《新華文摘》，1989年7月8日)，高的殘暴行動也許應該由他自己負責。因為高在被收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後，並不接受葉挺、項英等人的領導，而且處處抗命，仍然一心一意發展自己的勢力和地盤。終於在1939年6月，中共中央派人到合肥將高逮捕，經過三天的鬥爭，予以處死。

不過，他的罪狀並非殘殺百姓，而是不服從延安領導、發展「山頭主義」與「宗派主義」而已。

但處死高敬亭以後，「新四軍」第四支隊的軍紀並未見有甚麼改善，殘殺人命，一如既往。我親見的一件事便是一位族兄之死。前面述及我幼年的文字禍，曾提到在平格族兄家躲藏過一段時期，平格兄是鄉人尊敬的醫生，而且是官莊唯一的醫生。但他性格倔強，不肯聽人擺布。據知內情者事後透露，第四支隊的人曾數度逼他合作而他堅決不肯，因此在一個夜裏把他從家中抓了出來，用刀在他的咽喉上戳了幾個洞，他就死在家門外面的水井旁邊。我清晨聞訊趕去看他，他的屍體還在原處未動。這是我早年（大約在1944年）親歷的一件悲傷的慘事，至今記憶猶新。

如果「新四軍」第四支隊作為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在潛山一帶具有代表性的話，它留給當地百姓的則主要是恐懼，而沒有一絲一毫的理想的嚮往。整整九年間，從未聽說這支武裝力量代表着中國未來的希望，一個新世界將代舊世界而興起。一直要等到1946年重回城市，我才知道有「共產主義」這樣一套理想，並且有人號召青年為這一理想的實現而奮鬥。但是不巧得很，由於戰後我居住的城市是瀋陽，這個理想一開始便在我心中罩上了一道陰影。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我到瀋陽是在蘇聯紅軍撤走後不久，而蘇軍的姦淫搶擄在整個東北已激起了人民的普遍憤怒，我從本地同學口中聽到的令人髮指的暴行簡直無窮無盡。當時左傾的知識人眾口一詞地說：蘇聯已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它的今天便是中國的明天。蘇軍是從共產主義天堂中來的，但他們的行為竟然如此，這就使我無法對共產主義發生真正的信仰。

我最早正式接觸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在從瀋陽遷回北平以後。1947年年底，瀋陽已在共軍包圍之中，我們不能不離開。在北平住了十一個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華北局面又重蹈東北的覆轍，於是全家又離開北平，流亡到上海。但在北平這十一個月期間，我失學在家，無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學生偶有來往，因此才接觸到當時最敏感的思想問題。我又愛讀當時一些流行較廣的期刊，如《觀察》、《獨立時論》、《新路》之類，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論題，詳情留待後面再說。

回憶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須特別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長十歲，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三年級。其實我們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後便已參加了共產黨的「少年先鋒隊」。1949年以後，我才發現原來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且是北大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北平的學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發動起來的，不過每當大批學生在街上示威遊行時，他卻從不參加，往往在我們家中吃茶聊天。我們當面戲稱他為「職業學生」，他也付之一笑。1946年在東北時，他也常往來於北平與瀋陽之間，名義是「跑單幫」，買賣西藥，賺一點錢奉養他的老母親（我的姑母）。我記得他在瀋陽時，常常約朋友多人到我家聚會，在大客廳中關起門來談話，一談便是三四小時。1949年8月，我回北平時，他才告訴我當時在我家開會的都是黨中重要的地下領導人，因為當時北平風聲很緊，保不住身，因此轉移陣地到瀋陽活動。但他是一個很

懇切的人，確有一股為中國尋找新方向的熱忱，因此我很尊重他。我覺得他對我們一家(他的舅舅家)有真感情，並不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生任何芥蒂。我還記得1948年暑假，他帶着我和另一個年輕的親戚作三天三夜的近郊遠足，從城中徒步走到頤和園、玉泉山、香山等地。我們都沒有錢，各人背着一條毯子，隨時在風景區露宿。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今天回想還像是眼前的事。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輸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他的信仰是很虔誠的。由於我們之間互相信任，我很尊重他的看法，因此才開始研讀並思考種種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便是他介紹給我的。就這一意義說，他是我的一位「啟蒙者」。但俗話說：「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各人。」我自己探索的結果並沒有讓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我當然反對社會財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因此傾向於一種分配公平的體制，同時也願意接受某些涉及全體人民生活的大企業(如鐵路)應由國家經營，但是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當時許多人都討論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但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過程中，我發現他並不屬於非常激進的一群。例如對於他的校長胡適，他並不像多數左傾學生那樣一味譴責，有時也能持平看待。他當然責難胡適親美，但胡適在1947年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他卻不止一次加以稱許。另一方面，在企圖說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時，他也偶然使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武器。然而，他畢竟只是一位實踐者而不是理論家。我記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揚「宇宙一切皆變」的「真理」。我問他：這條「真理」也應是宇宙間之一事，它本身變不變呢？他冷不防有此一問，便很坦率地說，他的理論修養還不能立刻對這個問題作出滿意的回答。這是他「不知為不知」的具體表現，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並不建立在理智的認識上，甚至可以說，他對「共產主義」的整個體系實在不甚了了。若再參考和他同時代的黨內知識人的例子，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後有了新的覺悟，也無不異口同聲地說當初對信仰的選擇多少不免出於「誤會」。

1949年8月，我從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學時，表兄已是市長彭真手下的一個重要幹部，負責全市青年的組織和活動，經常到各大學和黨、團機構聯繫。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學，順道訪我而未晤。事後有人告訴我：項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說是你的親戚。我初聞「項子明」之名，為之茫然。幾分鐘後我才省悟，原來這是表兄的黨名。但這時他已成忙人，我再沒有機會和他深談。後來在文革初期，海外報刊有關於所謂「北京暢觀樓事件」的報導，記述了他反對毛的言論。不用說，他必已變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對象。

我最後一次和他聚會是在1980年代初的紐約。那時他以北大代書記的身份到美國訪問各大學，在西岸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東岸的哈佛大學都受到隆重的接待。由於事前約定，我們在紐約暢談了兩天，這是分別三十多年以後的重晤，彼此都不勝感慨。這次他雖然是官式訪問，所到之處皆獲禮遇，但他的意氣卻相當消沉。在談話中，我終於發現，他在文革後並不受中央

領導人的重視，北大已是一個冷衙門，何況他還只是「代書記」。但更重要的是，他對早年信仰顯然已發生根本的動搖。他自己沒有說過一句悔恨的話，但他的夫人（早年也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很率直地對我說：「你們（主要指我的父親）看得遠，幸而早出來了。」他在一旁也默認了這個說法。我不願再深入挖掘這個問題，以免觸及他的傷痛，而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最後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到紐約唐人街去吃飯，途中經過一座很大的孔子銅像。他看見了，忽然十分興奮，一定要和我在像前留影，作為紀念。在他早年信仰誠篤的時期，這是不可想像的事，然而他確是出於內心不可抑止的一種衝動。很顯然，在早年的信仰徹底幻滅之後，他的價值觀似乎向兩個源頭回歸：一是「五四」以來流行的西方主流價值，如民主、自由。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所參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識青年的。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主要表現在對於人的尊重。這是他對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

上面追憶了從1937到1949年我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九年鄉居生活是第一階段，我所接觸到的是「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我鄉間的種種活動。但當時我並不知道「新四軍」第四支隊是代表着共產主義運動的，甚至也沒有聽過「共產主義」這個名詞，更不用說了解它究竟是甚麼意思。直到第二階段，即1946年回到城市以後，我才明白共產主義是一個世界性的革命運動，其中有整套的複雜理論和一百年以上的革命經驗，終於在1917年以後在蘇聯獲得成功。當時左傾的知識人普遍相信：中國的革命必須跟着蘇聯走，這是唯一的出路；美國則代表着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階段，不久一定滅亡。這些說法，我在北平聽過很多次，當時很難判斷。

上述這些個人經驗很有限，不過來自真實生活中的體驗，和書齋裏的空論不同。最後，我想作一點反思：我的認識過程既然如此困難，他人想也相近。那麼，為甚麼這個外來的主義在中國能流行得那麼廣，又那麼快呢？

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背後的歷史因素是非常複雜的，這裏不能展開討論。最主要的動力當然是民族主義，尤其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刺激。1936年的「西安事變」和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是兩個關鍵性的轉折點（下面談抗日戰爭時再補充一下）。以「國際主義」為號召的共產革命運動最後竟靠民族主義的動力來完成，這是歷史的一大弔詭。但是我想談的不是這些後來的歷史進程，而是在開始的時候，即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為甚麼熱心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來？這些早期介紹人究竟是怎樣理解共產主義的？

我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首先是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現。從觀念發展到制度化，後世便有「均田」、「均稅」、「均役」等措施。「均」的觀念也從儒家傳到道家，從上層文化傳到下層民間文化，所以東漢時代的一部《太平經》便把「太平」的概念理解為「大平均」。我們可以說，平均主義的思想在中國一方面源遠流長，一方面無孔不入，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因而才有一拍即

合的效應。在「均」的思維框架之下，士大夫最感義憤的社會現象便是「豪強兼并」，即土地分配極端不均，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代董仲舒以來的無數奏議都是明證；這一反「兼并」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唐、宋，甚至更後。一般而言，「士」階層中人是極端同情貧民而鄙視富人的。

儒家另一有極大影響的價值觀是關於「公」和「私」的尖銳對比。士大夫一向都強調「公」是善，而「私」則是惡。《禮記·禮運》中的「大同」觀念一直是受到特別重視的。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為寫《大同書》，而主張革命的孫中山也宣揚「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又構成了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背景。

清末知識人通過傳統思想的接引而擁抱共產主義雖有其方便的一面，但也不是沒有代價的，最大的代價便是誤讀了來自西方的現代學說。清末中國知識人是從日本學者那裏接觸到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影響最大的是經濟學家河上肇(1879-1946)。河上肇當然對西方政治思想有較正確的認識，這是因為日本接受西學比中國早得多，日本的現代化也領先於亞洲各國。但是河上肇的中國信徒包括李大釗在內，究竟懂得了多少馬、恩思想和社會主義，則是一個很大的疑問。讓我舉幾個例子作為具體的說明。

我記得《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似與劉師培有密切關係。同時劉又提倡過無政府主義，因為他欣賞魏晉時期思想家鮑敬言的「無君論」。當時章太炎、吳稚暉、李石曾等許多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早期信仰共產主義的人也有不少是先信奉無政府主義，甚至分不清二者之間的界限。像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判斷中國是否可以實行共產主義？又如梁漱溟在回憶錄中說：他早年一聽見資本主義是維護私有財產的，便馬上大起反感，所以寧可選擇社會主義。他大概從來沒有聽見過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關於私有財產是文明基礎和個人自由的保障之類的說法，根本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只因有「公」和「私」兩個價值在心中，一聽見「私」便義憤填膺，只承認「公」是正面價值。又如黃侃(筆名「運甓」)寫過一篇名文〈哀貧民〉登在《民報》(1907年第17號)上宣傳革命，文中大意說：貧民是因被富人奪去了財產才陷於貧困的，這是極端的不平等。因此他號召所有貧民都起來，消滅富人，「復我仇讎，復平等之真，寧以求平等而死」。如果革命成功，自然是「貧民之福」，如不成功，則「當以神州為巨冢」，把所有富人和自己一齊埋葬進去。這篇文章當時轟動了革命陣營，其中顯然有共產主義的影子，等於要「一切無產者聯合起來！」

從這些實例可以看出，中國知識人最初選擇共產主義作為「救亡」的藥方時，主要是出於一種錯覺，他們對於這套理論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過。由於這套理論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們所熟悉的傳統觀念與價值相近(如「均」、「公」之類)，他們便毫不遲疑地奉為「真理」，願意為之獻出生命。不同的錯覺在「五四」以後仍然不斷出現，如認定共產主義才能給人以「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總之，這一選擇可以說是聚九州之鐵而鑄成的大錯。

今天回顧起來，我感覺最痛心的是：中國為這一選擇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但在發現這是大錯之後，竟不得不走回頭路。市場制度、私有財產、階級分化等都回來了，但卻出於不正當、不文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敗貪污竟成為這一畸形社會的內在特色。趙紫陽曾稱這一體制為「權貴資本主義」，因為其中「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不是在法律範圍內靠勤儉起家，而是由於與政治權力有密切關係，獲得種種特權與法外的方便。其中還有一些人更是化公有為私有。在這一從特殊怪胎產生的體制中，仗勢欺人是正常現象，而且不公平的程度與日俱增。

這正是令人痛心之所在，因為在遭受暴力革命的摧毀之前，中國早已有一個常態發展的市場機制。根據我以往的研究（余英時：《現代儒學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一和第二篇），至遲在明代後期，這個市場機制已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使中國社會結構和價值意識都發生了變化。以價值而言，「公」與「私」已不是互不相容，勢不兩立，而是彼此相關。因此，十六世紀已出現了喻變「遂其私所以成其公」的新說；李贄則發現了「私」的優先性，所以公然說：「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照這個見解，每一個人都首先是一「私」的個體，他的心也必然是代表他個人的「私心」。這一見解在現代哲學關於個人「身份」（identity）或「自我」（selfhood）的討論中，也可以找到很堅實的根據。可見過去一般人以為人之有私心乃起於人之私有財產的說法，是絕對站不住的；恰恰相反，人先有私心，然後才順理成章地發展出私有財產。不但如此，「富」也受到肯定。從十六至十八世紀，地方的種種福利，如印書、造橋、修寺廟、修宗譜、建立宗族義莊等等，都是靠商人捐出的錢。遇到饑饉或一城一鄉有危機（如明代「倭寇」侵犯），捐助大筆經費的也都是大商人，所以明代以來特別流行「富民是一方之元氣」、「藏富於民」等等觀念。根據我個人的研究所得，十六世紀以下中國社會一直在向新的方向發展，如果不是暴力革命的橫加摧破，中國今天也許是一個「富而好禮」的文明社會，不致走「權貴資本主義」之路，落得「為富不仁」的悲慘結局。

二 抗日戰爭的背景

1937至1945年的八年抗日戰爭，是二十世紀中國史上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本已搖搖欲墜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舊秩序，經日本全面武力侵略而徹底崩解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一躍而成為工業與軍事強國，它不但「脫亞入歐」，全面學習西方現代文明，而且學到了西方的「野蠻」——這是指一般所謂「帝國主義的擴張與侵略」。所謂「帝國主義」，基本上起源於西方的海上霸權諸國爭奪市場、世界資源等等。英國最先進也最成功，所以殖民地遍布天下，其他如法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無不爭先恐後，到處擴張。德國因為統一得太遲，殖民地已被別國瓜分光了，因此才成為兩次歐戰

的禍首。日本崛起得更遲，由於本身太缺乏自然資源，侵略的眼光便投向亞洲大陸，先是朝鮮半島，進一步則是中國。何況早在1592年，豐臣秀吉已派兵十六萬人渡海佔領了漢城，並準備攻取中國的北京。豐臣的侵略雖未取得預期的效果，並因他的早死而中止，但畢竟為三百年後的日本軍國主義發揮了示範作用。

1902年英國與日本建立「英日同盟」，可見英國已承認日本在東亞的霸權地位，1905年日本在東北打敗了俄國，接收了俄國在東北的一切權益(控制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大連兩大港口，以及經營從長春到大連的南滿鐵路)，更加強了它的霸權基礎。1910年日本併吞朝鮮之後，立即將目標轉向中國的東北(東三省，即所謂「滿洲」)。

由於「東北王」張作霖不肯完全聽從日本的擺布，1928年日本關東軍設計炸死了他。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竟藉口「瀋陽事件」而全面攻佔了東北，史稱「九一八事變」。今天日本史研究者已證實這是日本軍方準備已久的預謀行動，決非由「偶發事故」所造成。日本為甚麼在1931年開始侵略中國呢？原因很簡單：國民黨北伐以後定都南京，張學良在1928年11月歸附國民政府，東北也懸掛了青天白日旗，日本軍方大概感到，如不及時動手，中國很可能變成一個統一的現代強國。

1937年在北平發生的「盧溝橋事變」也同樣不能理解為「偶發事故」，日本軍方再一次感到非搶先動手不可的壓力。為甚麼呢？因為國民黨政權在1928至1937年這十年間也進行了不少現代化的努力，包括軍事現代化。1930年代日本侵略步步加緊的時期，南京政府似乎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一再退讓，以致為左派所抨擊，學生運動也因此愈來愈升級。但事實上，國民政府一方面積極訓練新式軍隊(聘請了德國軍事顧問)，另一方面成立國家資源委員會，動員各方面的科學家參與經濟建設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創辦鋼鐵、發電、



「盧溝橋事變」引發中國全面抗戰。(資料圖片)

機械、兵工等基礎工業。1936年聞一多到河南安陽調查甲骨發掘的情形時，也順道參觀了洛陽的軍事訓練學校。他回清華大學後對學生說：這次經過洛陽，看到政府對抗日還是有所準備的，與北平所見不同。因此他說：「我們不能對政府完全失望。」（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頁486。）日本軍方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背景主要在此。

蔣介石最後決定對日作戰雖因迫於民意壓力而然，但畢竟準備遠遠不足，犧牲極為重大。1937年上海的「八一三」淞滬抗日，打了三個月，蔣在十年中所訓練的新兵死傷過半。當時日本軍方誇口，三個月內便征服整個中國。蔣為了向國際社會證明日方狂言不足信，因此不惜任何代價死守上海戰線。此役之後，新兵補充便成為嚴重問題。以後雖仍打了幾次勝仗，但敗退居多，只能「以時間換取空間」了。正如1944年12月6日胡適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所云：「在這次戰爭中，中國的問題是：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不得和一個第一流的軍事與工業強國〔日本〕打一場現代戰爭。」（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203。）

抗日戰爭的後果更是中國幾千年未有的大劫。以我的鄉間為例，1937年冬初回去時大致還算安靜，但不久便有大批廣西軍隊駐扎或過路，軍紀極壞，騷擾鄉民，幾無寧日。再加上「新四軍」加強建立游擊基地的活動，也時時波及官莊。後來還有盜匪出沒，一夕數驚。我在抗戰後期常在夜間看見後面山林中有手電筒閃光，鄉人都知道是搶匪，企圖俟機下山來打家劫舍。總之，抗戰期間鄉間秩序顯然一天不如一天。據老輩回憶，在清末民初時期，鄉人攜帶銀子或銀元到安慶、蕪湖等城市去購物，路途中並不擔心遇到盜賊。

廣大農村秩序的敗壞為戰後翻天覆地的大動亂鋪平了道路。這裏我要特別引美國漢學領袖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最後一部著作《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的話，來說明抗日戰爭的禍害：

若不是日本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府統治下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影響。在戰時的環境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要打階級戰的新型態的中國。二十世紀的這一群中國革命者，將要攻擊並重組已經有至少三千年歷史的社會結構了。（費正清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台北：正中書局，1994〕，頁356。）

為甚麼要引費正清的論斷呢？因為他從1930年代起便厭恨國民黨，同情共產黨，但晚年則重新調整了他的看法。這部書是1991年9月11日完成的，第二天上午他把原稿送到出版社，兩天後便逝世了。這部書真成了他的「晚年定論」，他是美國人，超乎中國內部政治恩怨，判斷比較客觀一些。

抗日戰爭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國共產黨，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共從江西流竄到陝北，朝不保夕的危機感仍然揮之不去，所以林彪有「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因此1930年代初開始，中共在中國各大城市發動抗日運動，逼國民黨停止「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反蔣的社會及政治名流和左傾的大學生承擔起這一任務，通過遊行示威和組織活動，使抗日的聲音一天比一天響亮。1936年，中共竟說服了東北軍的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造成轟動一時的「西安事變」，終於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但戰爭如不發生，中共仍不能到處建立游擊隊和地方政權。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中共才絕處逢生，有如龍歸大海。

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階層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然而日本逼得如此之緊，除了奮起抵抗之外，已別無他途。汪精衛、周佛海等人一意求和，甚至不計一切，去日本佔領區建立傀儡政權，便是因為估計到戰爭持續下去必為中共提供擴展勢力的機會，最後則將中國送進蘇聯的懷抱。這在早前出版的《周佛海日記全編》(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中可以找到明確的證據。汪精衛在寧漢分裂時本是左派領袖，與中共關係最深，周佛海更是1921年中共創黨的領袖之一，陳公博也曾一度參加過共產黨。正由於他們對中共的認識很深，憂慮也遠遠超過他人。他們急於求和，以為這是唯一挽救中國陷入蘇聯極權體制的辦法。他們對與日本實現和平的幻想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對於中共利用戰爭以奪取全國政權的估計卻十分準確。

據比較審慎的統計，從1937到1945年，中共黨員人數由4萬增至120萬，軍隊則由9萬左右增至91萬(參見費正清：《費正清論中國》，頁362。但據陳永發的說法，1937年軍隊人數僅4萬左右。參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341)。中共因抗戰而得到大幅擴張的機會，上引數字即是最有力的說明。本來被圍困在陝北一個角落的政權，在戰爭發生以後竟迅速向全國擴散，至1940年年底，中共各根據地所控制的人口已將近一億(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341)。

抗日戰爭中正面的陣地戰當然由中央政府的軍隊全部承擔了下來，中共則從旁以運動戰或游擊戰對日軍加以牽制。在整個對日戰爭史上，中共宣傳最熱烈的共有兩次戰役：一是1937年9月的「平型關之戰」，由林彪指揮；另一是1940年8月的「百團大戰」，由彭德懷指揮。關於平型關之戰，楊奎松曾作過分析(楊奎松：〈有關平型關戰鬥的幾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2期)。當時國軍集結在平型關準備死守，共軍則奉命參加右翼防守。但共方最後決定在附近山谷埋伏四千兵員，等日軍輜重和補給部隊七百人經過時，起而突襲。日軍部隊是非戰鬥性的，戰鬥兵不過百人而已。儘管人數如此懸殊，共軍還是經過了十幾小時的戰爭，傷亡了四百人，才能全殲日軍。這一戰對內的宣傳作用極大，許多不明內情的青年都深信中共有打敗日軍的

能力，因此投奔延安者絡繹於道。但以對日抗戰而言，很難說有多大意義。至於百團大戰，最初的目標只在破壞和攻擊公路和鐵路，以突破日軍的封鎖，並不是正面交鋒。由於交戰之初日軍受到奇襲而損失頗重，彭德懷才擴大兵力至百團左右。然而，此戰引起日軍此後對中共華北根據地的集中掃蕩，一連三年，使中共佔領區不斷縮小，處境十分艱苦。所以毛澤東當時對此戰雖不能不公開讚揚，但暗地裏則極為不滿，認為是戰略的錯誤。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百團大戰反而成為彭的一大罪狀了。同樣地，林彪叛毛之後，平型關之戰也頓時變成咒罵的對象，只有負面的意義了。

總之，上面的基本事實已充分說明，日軍全面侵華為中共提供了千載一遇的機會，使它轉敗為勝，終於奪得天下。

最後，我還要補充一點，蘇聯以1945年的《雅爾達協定》(Yalta Agreement)為藉口，在第一個原子彈投下廣島之後才派兵湧進中國的東北，更是為中共奠定了打天下的堅實基礎。蘇聯不守三個月撤離的諾言，一直拖延了八九個月才完全退出東北。在這一漫長時期，蘇方一方面施行海、陸、空全面封鎖，阻止國軍進入東北，另一方面則暗運大批共軍及幹部到東北，在各處布陣並建立基地。等到1946年4月國軍出關時，共軍已有四五十萬人遍布東北，對國軍已處於「以逸待勞」的絕對優勢了。現在讓我引一段當時中共出關幹部的證詞：

國共兩黨對東北都是志在必得，我們在離開延安時中央首長就說，有了東北就有了全中國。因為東北的外部環境是背靠蘇聯，我們革命的勝利和將來建國都得依靠老大哥。內部環境是物產富饒，工業基地。……後來的事實也證明，解放全國的三大戰役，更具攻堅性的兩大戰役，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都是來自東北的四野打的。……抗戰一勝利，國民黨就借用美國艦船，把它的精銳部隊新一軍、新六軍等運來東北，其他部隊也從平津出發經山海關北上，但它終究晚了一步，在這之前，我們冀熱遼的部隊已經進了瀋陽，同時還從山東、蘇北等地抽調十一萬大軍，海陸並進開赴東北。中央更派了近三分之一的(二十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及兩萬名各級幹部到東北工作。(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頁155。)

由此可知，八年抗日戰爭和戰後蘇聯佔領東北早已決定了二十世紀下半段中國的命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向中方表示侵華的歉意，毛澤東毫不遲疑地答道：我們很感謝你們的皇軍，幫我們早日完成了中國的革命。這不是客套話，確實是肺腑之言。